

研究論文

#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 以新浪微博為例

龐雲點、苗偉山

## 摘要

本文以新浪微博平台的意見領袖群體為研究對象，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了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關注關係」以及「互動關係」，探討了「群體極化」現象產生的結構性原因為網絡形成之初的「結構極化」。本文選取分析了234位意見領袖的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發現，傳統對於知識分子的「左派」、「右派」的劃分仍然是微博當中意見領袖群體派系分立的關鍵性因素；相反，不同「行業領域」則沒有形成行業間派系分離的情形，人們會主動訴求與不同領域的溝通。同時通過對四年中微博內容的歷時性分析發現，「左派」、「右派」群體在互動當中一直保持著與關注關係一樣的派系分立的情形，但是衡量分立程度的E-I值並沒有大幅變化，也就是說這種網絡互動並沒有體現出動態極化現象。

關鍵詞：意見領袖、網絡結構極化、社會網絡分析、群體極化

龐雲點，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講師。研究興趣：新媒體與社會、社會網絡分析。電郵：yxpang@126.com

苗偉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興趣：新媒體與社會變遷、網絡抗爭、互聯網政策。電郵：weishanmiao@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9月19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8月31日。

---

Research Article

##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The Case of the Sina Microblog**

Yunxia PANG, Weishan MIAO

---

### **Abstract**

Opinion leaders a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ith widespread SNS use. How opinion leaders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or their “followers” on SNS is becoming a key factor which may have great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n abundance of research focusing on this topic from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on political elites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While there are only a few studies in China exploring Chinese elites who have interest on public affai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mposition,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of opinion leader groups on Chinese microblogging platform Sina Weibo,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ough there is only one ruling party in China, the elites still have different specific ideolog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34 selected opinion leader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left” and “right” intellectuals was still the key factor to differentiate opinion leaders on Sina Weibo. These opinion leaders mainly followed and interacted in the principle of homophily, meaning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se political

---

Yunxia PA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and societ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eishan MIAO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online activism, Internet policy.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The Case of the Sina Microblog*

leanings aligned with theirs. We called such homophily principle in the context of SNS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which was the ba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However, opinion leaders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did not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of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eager to follow and communicate with those in other occupations. By analyzing the “following” and “interactive” patterns among the opinion leaders over 4 years, we found the E-I index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did not fluctuate significantly, although opinion leaders still cluster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homophily, which implied that group polarization does not show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densities.

Keywords: opinion leaders, group polariz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Pang, Y., & Miao, W. (2017).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The case of the Sina Microblog.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2, 59–90.

## 鳴謝

本文是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微博『大V』的人際圈子與互動效果研究」(項目編號:14CXW025)成果之一,本論文曾獲台灣第三屆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優等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意見領袖研究作為輿情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年獲得了學者不少的關注，尤其在社交網絡日益發達的今天，意見領袖除了依然擔任著大眾媒介到普通群體的二傳手實現兩級傳播(Lazarsfeld, 1955)以外，自己也成為了一個意見表達的發源地，因此有學者開始關注新的技術帶來的關於「二級傳播理論」的改變問題，提出了「一級傳播」理論(Bennett, 2006)，網絡中的事件傳播相當程度上在依賴意見領袖的傳播與解讀。國內對於意見領袖的研究通常選取相對傳統的角度，比如意見領袖的自身特徵與識別、意見領袖的傳播力、影響力與作用等(丁漢青、王亞萍, 2010)。常使用的方法是選取具體的熱點事件，研究意見領袖在其中的影響與作用，或者研究其在謠言傳播以及危機公關中的作用(李彪, 2011)。

但是，國內較少有研究系統的關注網絡意見領袖作為一個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的群體的某種特質，以及這種互動所產生的輿論效果。比如我們所謂的微博「大V」，他們對粉絲產生的是單向影響(雖然也有少數的互動，但是相對來說可以忽略)，但是「大V」彼此之間可能形成相互關注、互動，從而對彼此產生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形成了微博生態圈中頂層的互動圈子。而這些圈子是如何構成的，他們有著怎樣的動態變化，影響力如何等都是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

## 文獻綜述與研究視角

### 同質性與結構極化

首先，意見領袖如何構建自己的關注圈子？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現實交往中，同質性而非多元化是人們選擇朋友時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Brass, 1995)，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見，有學者認為，由於一個人的社會背景具有結構多元性(structural heterogeneity)比如工作地點、所在的社團群體或者生活中的鄰里關係等，這些生活中的背景其實為你個人構建自己的社會網絡提供了一個選擇空間，人們通常會綜合上述背景進行選擇，帶來的結果就是個人網絡的多元化(Scheufele, Hardy, Brossard, Waismel-Manor, & Nisbet, 2006)。那麼在社交網絡平台上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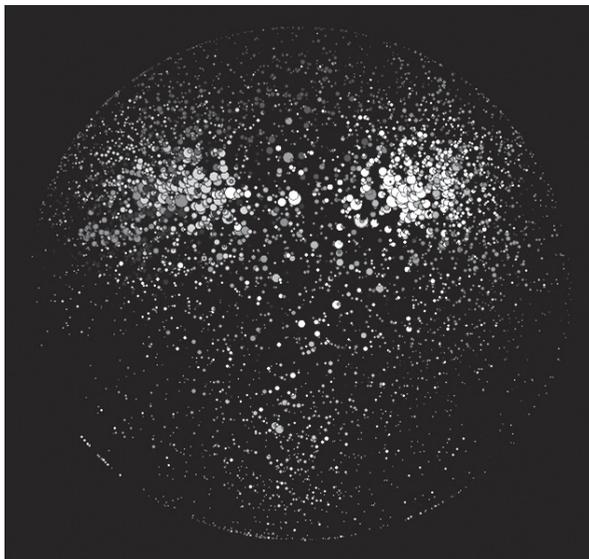
Neuman (1991) 認為，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同質性原則具有很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科技的發展通常也不會改變這一原則。而 Brundidge (2010) 則提到，線上的互動和線下總是有所區別的，線上的討論可能不是單純的按照某一個原則：比如選擇性關注或者是社會邊界弱化 (weakened social boundaries)，而是會結合兩者形成一個新的原則：即大眾線上互動的不經意原則 (inadvertency)，最終形成多元化個人網絡。可見網絡平台上的討論網絡同質性還是多元化也仍然具有爭議。

上述的實證研究多數採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的，個人網絡是多元化還是同質化的衡量主要通過問卷中的問題獲得：你的朋友們多大程度上和你的意見是一致的，然後採用 1-5 級量表進行衡量 (Brundidge, 2010; Hart, Feldman, Leiserowitz, & Maibach, 2015; Scheufele et al., 2006)。

那麼如果直接用與社會網絡相關的方法，考察人們在網絡空間中的連接構建，又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Kelly (2008) 依據美國的政治類博客之間的相互鏈接畫出了社會網絡分析圖 (圖一)。從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博客作者們在網絡結構上的圈子特徵，支持民主黨與支持共和黨的兩類博客群體相對獨立，其間的橋很少，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圈子分離結構。

圖一 美國博客的鏈接網絡分佈圖，藍色 (偏右上方) 為民主黨，紅色 (偏左上方) 為共和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而隨著 Twitter 平台使用的日漸廣泛，學者們開始專門針對 Twitter 平台上的政治傳播進行研究，Peng、Liu、Wu 和 Liu (2014) 研究了美國的國會議員在 Twitter 上的關注與互動情況，結果發現他們關注和溝通的網絡呈現了很強程度的黨派同質性。Lim 和 Park (2013) 研究了韓國議會成員在網頁上的共現關係，發現其可視化效果與 Kelly (2008) 非常相似，都呈現了同質化群體抱團，兩大黨派之間較少存在橋連帶的蝴蝶狀 (butterfly pattern)。

Maoz 早在 2006 年就提到了一個群體重疊性指標 (clique overlap index, COI)，用來描述上述的網絡結構很合適，這個指標主要描述了兩種狀態：一個是所謂的最大限度的極化 (maximum polarization)，意思是，如果有一組群體，那麼最大限度的極化就是雙極 (bipolarity)，即群體分成兩個等份的小集群，且兩者之間沒有中立者。另一種情況是，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小群體，並不要求群體間完全獨立 (如圖一) (Maoz, 2006)。對圖一的狀態，Baldassarri 和 Bearman (2007) 還有另外一個描述：社會極化 (social polarization)，即社會的個體是否處於一個同質化觀點包圍的個人網絡中。

「社會極化」這個概念非常適合於現在的社會網絡環境，描述人們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注網絡，本文將這種社會極化的網絡結構定義為「網絡結構極化」(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結構極化是一種相對靜態的、結構性的極化，是一種更適合於社交網絡時代的極化描述方式，結構極化也將成為在社交網絡狀態下其他極化研究的基礎之一，這將在文獻的第二部分做更為詳細的論述。

上面的研究主要是從關注關係的角度進行的，而且已經有研究表明 Twitter 上的關注關係是相當穩定的 (Kivran-Swaine, Govindan, & Naman, 2011)，那就意味著在 Twitter 這類社交網絡平台上，一旦形成了關注關係的極化結構，就會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這就為信息繭房 (information cocoon) (Sunstein, 2006) 的理論提供實際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從互動的角度來看，社交網絡上不同的群體也呈現了較為一致的同質化的結果。Conover、Ratkiewicz、Francisco、Goncalves、Menczer 和 Flammini (2011) 研究了 Twitter 上建立連接的政治傾向同質化問題，發現 Twitter 上的互動是高度隔離化的 (segregated)，

##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人們更願意轉發和他們政治傾向相近的內容，德國的學者也發現了類似的結論，人們在Twitter上的討論是按照政治傾向產生隔離的 (Feller, Kuhnert, Sprenger, & Welpel, 2011)，Boutet、Kim和Yoneki (2012) 研究2010年英國大選時的行為時也發現，人們更願意轉發自己所在黨派的Twitter。

Himmelboim、McCreery和Smith (2013) 直接討論了Twitter上群體互動的模式 (pattern)。與此前研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並沒有選擇特定的群體作為研究對象，而是選擇了十個有爭議性的話題，分別是包括全球變暖、赤字問題、移民改革等等，針對這些話題對最近發表看法的500個使用者 (node) 進行了社會網絡分析，結果發現：第一，從集群 (cluster) 角度看，同質化明顯，不同的集群中，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比例呈現顯著差異。而且圈子當中意見表達的信息數量越多 (無論左右，加總的總量越多)，則自由派與保守派比例相差越懸殊。第二，信息內容的政治傾向和所引鏈接的政治傾向強正相關 (0.87)。

Colleoni、Rozza和Arvidsson (2014) 也針對較為全面的Twitter使用者和相關話題進行了同質化的探討，考察人們在使用Twitter的過程中，是否形成了同質化的討論網絡。Colleoni等提出了一個「普遍同質性」的計算方法，即用某個用戶的關注同黨派人的連接數除以他關注的所有人的數量，所以這個同質性比例的數值處於0-1之間。最後他發現在他分析的1萬名左右的Twitter使用者當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傾向的人群互動中的普遍同質性都超過了0.8。

可見，無論是從特定話題出發，還是對固定的群體進行分析，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研究結果。而且上述Himmelboim等 (2013) 和Colleoni等 (2014) 的研究也可以解釋很多學者的一個擔憂：有些人關注他人、或者與他人互動的目的是為了反駁他，所以圈子分析可能會無法辨別這種反向的關注或互動，但是從美國的實證數據來看，的確有這樣的人，但是非常少，贊同者仍然是絕大多數。

由上述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兩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我國微博平台上的意見領袖是如何構建自己的關注圈子的？如果是同質化的原則為主，那麼是否會出現結構極化的情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研究問題二： 意見領袖之間是如何互動的？是同質化的還是多元化的，即是同圈子的人更易溝通，還是跨圈子的人更多的在溝通？如果存在溝通中的結構極化，那麼是否存在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中間人」(broker)群體，能夠讓這種對立性的互動更加順暢，甚至能夠增進不同立場人之間的相互理解？

Himelboim等(2013)也發現，在互動的過程中，圈子當中意見表達的數量越多(無論左右，加總的總量越多)，則自由派與保守派比例相差越懸殊。

在歷時性研究方面，Freelon、Lynch和Aday(2015)發現，在研究的九個組當中只有兩個組相對明確的隨著時間變得更加同質化，其他組都是直接形成了同質化的分組，同質化程度接近或者高於80%。

研究問題三： 在一個長時段的互動過程中，意見領袖們的互動習慣是否會產生變化？是會轉而尋求多元化，還是會在同質化的圈子中更為密切的互動，強化自己的認同，從而形成類似於群體極化的效果？

### 群體極化與社會學極化研究

針對本文使用的結構極化概念，這裡需要將其與現階段國內極化研究的兩個較為重要的概念進行一個簡單的區分。

首先，現階段國內在極化研究中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學家桑斯坦(2010)，主要使用的是群體極化的概念。

群體極化最早的研究產生於心理學領域，Stoner(1961)發現，群體討論形成的決策，比群體內每個單獨的成員分別作出的決定更為冒險(riskier)，即群體的互動會導致最終的結果超過單個成員的極端值。進一步的，研究者發現風險偏好的轉移只是群體極化的一種特例，很多其他的情況也有這種傾向於一方的轉變，人們開始使用「選擇轉變」(choice shift)來代替(Pruitt, 1971)。於是群體極化的研究開始更為普遍的展開(Myers & Lamm, 1976)。

##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與最初的群體極化的概念相一致，桑斯坦潛在的強調了群體極化產生的兩個要求：第一，參與討論的群體本身需要具有主導的既有傾向性；第二，群體內部對該問題進行較為封閉的探討（桑斯坦，2010）。因為最終是否形成極化，網絡同質性是關鍵因素，眾多研究也發現討論網絡多元化和極化呈現負相關（Hart, Feldman, Leiserowitz, & Maibach, 2015; Lee, Choi, Kim, & Kim, 2014; Wojcieszak, 2010）。

現階段國內關於極化的不少相關研究，其實借鑒的也都是群體極化的概念，但是卻恰恰忽略了對這兩個前提性問題的實證研究（鄭天，2012）。從本文的角度來說，結構極化恰恰解決的是這個前提性的圈子同質性問題。而且結構極化的概念相比簡單的同質性原則，更適合說明社交網絡這樣的網絡空間中同質化群體的狀態與格局。

針對桑斯坦強調的討論群體具有較強程度的同質化既有傾向的前提，已經有眾多的研究表明，外界的影響都是基於你最初已經具有的意見的基礎上來起作用的（Price, Nir, & Cappella, 2005），既有傾向與最終討論的結果呈現很強的正相關。極端的例子比如Ebbesen和Bowers（1974）在實驗中給被試聽十個論據，其立場是冒險與保守比例分別從1:9過渡到9:1，最後發現群體組成比例與極化程度的相關性達到了0.98，作者主要想要證明的就是已有的意見構成將會最終影響極化的趨勢。

與群體極化的關注主要是人們短期、暫時的意見轉變不同，DiMaggio、Evans和Bryson（1996）等社會學家關注的則是相對長期的、整個社會的意見極化（DiMaggio et al., 1996; Evans, 2003; Fiorina & Levendusky, 2005）。這種對於極化的關注一則是因為對社會普遍現狀的一種關注，比如對墮胎等爭議性話題，在10年以上的範圍內，爭議是加劇了還是逐漸彌合了，這對於瞭解整個社會是否產生了關鍵問題的分歧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其二，由於他們擁有大量的社會調查數據，比如GSS等等，這些數據足以支持學者們做跨時段、歷時性的極化研究。

可以看到雖然使用的都是極化的概念，但是其實從研究方法的使用，到關注的側重點都非常不同，而本文更關注的是在社交網絡環境下，群體的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這是進行群體極化研究的前置性研究，與社會學的長時段研究則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問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 結構極化與意見領袖、同質化準則

可以看出，進入到社交網絡環境，利用全網的實證數據之後，相對來說，學者們得到了較為一致的同質性圈子的結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大多數研究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精英群體，尤其是各國不同黨派的政治人士(Lim & Park, 2013; Peng et al., 2014)。雖然Colleoni等(2014)在最初的選擇研究對象時是全網隨機抽樣的，但是在第一次編碼之後，作者篩選掉了那些既關注民主黨又關注共和黨的使用者，而僅僅留下了關注單一黨派的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這其實是人為的提高了使用者的政治敏感度、政治明確性。Brundidge(2010)雖然認為多元化是人們構築網絡關係的主要原則，但是也承認，對於那些更加有明確觀點的人來說，選擇性關注才是他們的主要原則。對美國民眾的極化研究也是如此，雖然對普通民眾群體是否存在極化現象有所爭議(Evans, 2003)，但是總體來說美國的精英群體的極化現象十分明顯則已經達成了相對一致的認識(DiMaggio et al., 1996; Fiorina et al., 2005)。Stroud(2008)也發現黨派群體(partisans)是最容易選擇性關注的群體。

可以看到，精英群體的極化在國外已經成為相對確定的狀態，那麼在我國的情況如何是值得考量的。因為與國外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國在政治上，並沒有明確的黨派之分，只擁有統一的執政黨，不過在意識形態上，我們的確存在著左、中、右的差別，那麼我國的精英群體的立場區分是否會體現在社交網絡平台上呢？持有不同的立場的人是否會形成不同的派系，進而形成本文所談到的結構極化的現象值得考察。

需要強調的第二個問題是同質性的不同面向。已有的研究中，群體同質性從最宏觀的層面看可以包括國家、民族、種族、性別等(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 Zhao, 2008)。但是這些認同對於本文來說並不那麼適合，一方面國內的社交網絡相對封閉，國家、民族、種族認同並非國內的重要認同，另一方面年齡、性別等在網絡上又無法體現。在知識分子精英層面，意識形態的區別可能是一個更為典型的區別。這一區別的有效性已經在美國的政治博客研究中有所

##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體現 (Kelly, 2008)，學者們也提到基於政黨和意識形態的研究是主要的極化研究維度 (Lee et al., 2014; Wojcieszak et al., 2011)，因此本文也將採用這個視角來作為對意見領袖們進行同質化區分的首要維度。

此外還選取了意見領袖們的所屬職業領域作為另外一個分析維度。職業領域也是學者們在進行網絡聚類分析過程中非常關注的維度之一 (Etling, Kelly, & Faris, 2009; Etling, Alexanyan, & Kelly, 2010)。

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四：** 哪種同質性會成為意見領袖們構築同質化網絡的核心原則？政治立場還是職業劃分？

##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選擇了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意見領袖彼此之間的「關注網絡」以及「互動網絡」，分析社交網絡平台上的結構極化問題。

### 研究群體

本文最終選擇了新浪微博上的 234 位意見領袖為分析群體。選擇的方法主要是通過新浪微博的名人堂，按照粉絲數量的排序依次選取。由於新浪名人堂中僅提供前 1,000 位的排名，除去娛樂明星、體育明星等較少談論政治話題的群體之外，剩餘的 231 名全部計入了樣本考察，除了粉絲排名靠前的 231 位以外還有 10 名意見領袖，主要是筆者根據編碼和分析過程中的個人感受，選取的被較多意見領袖轉發和關注，但是粉絲數量相對較少 (超過 50 萬，此外的 231 位都超過了 100 萬的粉絲) 的人 (初次取樣時間為 2012 年 12 月，後續數據收集時間為 2015 年 9 月，第二次數據收集時有 7 個微博已經註銷，在左右對立群體當中包括以下五位：吳祚來、方舟子、石頭 1986、李承鵬、慕容雪村，全體樣本中還缺少了左小蕾，經濟觀察，因此本文最終的分析總體為 234 位)。

由於本文將會採用社會網分析中整體網的分析方法，所以對於群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體的選擇只要滿足研究需求即可，不嚴格要求抽樣代表性，而現有的研究群體滿足了整體網分析的兩個關鍵要求：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且都是意見領袖。

##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與研究設計

由於本文特殊的研究目的，即希望關注意見領袖是否形成了派系化的結構極化，所以本文採用的是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中的整體網絡(whole network)分析法，而沒有採用個體網絡分析。整體網絡分析主要關注的是整個群體的結構，運用的主要指標是網絡的中心度、密度分析來透視整體的結構化特徵，以及進行小團體分析、派系分析等。

而且整體網分析的情況下，也可以繼續深入探討諸如派系之間的結構洞問題，是否存在溝通兩個派系的橋節點等。

劉軍認為，整體網研究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推廣，不如說是為了揭示其結構，鑒於不同類型的結構對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這種整體網絡結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劉軍，2009：32)。

本研究主要的設計環節如下：

第一，本文通過整體網分析方法主要關注意見領袖的「關注網絡」與「互動網絡」兩個部分。前者是靜態的，後者是動態的。相互關注關係即採用新浪微博平台上意見領袖之間的相互關注關係數據(分別於2012年12月和2015年9月獲取)，互動關係包括轉發和評論兩種，主要分年獲取，所有數據都是從新浪的API接口直接抓取。

第二，在獲取了所有的互動數據之後，本文將分析2011-2014年的互動情況。

第三，對意見領袖的左右派系以及所屬領域進行預先編碼。主要依據對左右派別的文獻梳理，在Nvivo中搜索關鍵詞，然後根據對關鍵問題的看法進行所屬派系編碼。具體編碼標準見下文。本研究的編碼工作由研究者與另外一位編碼員擔任，編碼員在正式編碼前，接受了正式編碼訓練，並從整體樣本中隨機抽出10%、共24位意見領袖進行信度檢驗，根據相互同意度和複合信度公式進行檢定(維曼，2005：168)：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相互同意度  $R = 2M / (N1 + N2)$

M：完全同意的數目

N1：A 編碼員的同意數

N2：B 編碼員的同意數

依上述公式本研究得到兩位編碼員的信度達到了0.80，是內容分析中較為合適的分析標準。

### 網絡中意見領袖的「左」與「右」

《全球政治中的左與右》提到，全球政治是左與右的一場最重要的辯論。左與右是詮釋地方、國家與全球政治的最為常見的視角 (Noel & Therien, 2008, p. 3)。

而在我國，左右的紛爭也不只是一種學術的紛爭，而是作為轉型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態度表達。雖然左右的爭論更廣泛的存在於精英學者中間，但是它的影響卻不容小視，至少如果是建設性的影響，那麼將對未來中國的轉型之路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筆者看來，網絡中的左派與右派的紛爭其實已經超脫了傳統對於精英意識形態立場的一種劃分模式，而成為網民們對於政治立場的一種常見的劃分方式，因此這種區分方式可以說既是本土化的，又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可區分性的。比如即使普通的使用者還不太分得清楚其中的差別，但是對於那些明顯的為現有政治體制說話的人，大家常常都會賦予「五毛」的稱呼。

正是因為這種在群眾中的普遍性，以及意見領袖們的影響力，因此分析意見領袖們在左派與右派問題上的分歧與互動就顯得格外有意義。

一直認為自己是中道理性者的蕭功秦 (2012：1-3) 在他的《超越左右激進主義》中提出，自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就存在著兩種激進主義思潮，一種是回到「文革」時代的左翼激進主義，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義時代；另一種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右翼激進主義。兩方都是相當強勢的聲音，他們都力求佔據網絡與民間話語的制高點，影響中國未來20年的歷史選擇。雖然經歷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的政治淡漠 (political apathy) 期，但是隨著近年來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矛盾的彰顯，腐敗、貧富分化、國富民窮、社會不公等等問題的存在，知識分子們的焦慮又開始增加，未來的選擇之路又成為了關注的焦點。

那麼具體來看，究竟左右兩派的區別在哪裡，本文以怎樣的標準來明確兩派的劃分？

具體來看，中國的左右路線之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細分。

### I. 哲學層面

潘維在《當代中華體制》(2009：82)一文中給出了比較簡單的闡釋，即右派的自由主義背後是權利意識，而新左派的背後是中國更為傳統的責任意識。西方是在中古以後發展出「權利本位」思想的，主要的目的是反封建，但是中國一直缺乏反封建的任務，所以古老的「責任本位」思想一直延續下來。自由主義體現的是基於權利意識之上的公民意識，對政府的約束，對市場經濟規則的重視，法制觀念以及民主憲政等等。而責任本位主義意識則是主張官員應該照顧百姓，開明專制或者是新威權主義是新左派的嚮往。

### II. 政治方面

朱學勤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分歧何在》(1999：420)一文中提到：當新左派朋友們提倡批判市場機制的時候，自由主義則在呼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雙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

但是現階段似乎新左派已經不懼於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因此識別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而在於同意政治體制改革包含哪些方面，比如新左現階段會同意反腐，同意監督，但是不會同意民主與憲政。從政治主張來講，新左派強調在權威的干預之下取得社會公正。部分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國家。

自由主義在政治上要求代議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者少數人專制，也反對以多數人的名義實行群眾專制。

### III. 經濟層面

新左派批判資本，否定資本主義，反對跨國公司，仇恨市場拜物教，批評全球化和世貿組織。

自由主義則主要是要求市場機制，承認私有制，保護自由競爭。

#### IV. 對美國的態度方面

左派對美國持有一個相對批判的態度，一方面具有更加明確的自覺意識，一方面對美國制度的弱點以及現實的弱點會常常提出質疑；右派則是相對支持的態度，認為美國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無論從政治體制還是經濟制度設計。

由於派別的左右在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標準，上面的表述已經較為清晰的給予了闡述。又由於網絡討論中會涉及到一些常見的熱點問題，因此本文也融入了樂媛、楊伯澍(2009)對網絡論壇中左右對立群體的分類標準，最後給出了一個自己的標準，見表一。

表一 左右派別區別對比圖

		激進左	溫和左	中立	溫和右	激進右
政治	憲政、民主		a		✓	✓
	新聞自由				✓	✓
	支持政府現有路線		✓			
	大政府		✓			
	重視平等與公平	✓	✓			
經濟	土地私有制					✓
	市場經濟		a		✓	✓
	國企私有化					✓
	共同富裕	✓	✓			
	反思市場經濟、全球化	✓	✓			
對待美國	學習、嚮往				✓	✓
	反對或反思美國霸權主義	✓	✓			
文化	認同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				✓	✓
	傳統儒家文化		✓			
歷史問題	支持文革	✓				

“a”：由於溫和左是支持政府路線的，因此現有政府的政策導向都會影響到溫和左派的立場選擇，尤其是近些年，一些溫和的左派開始紛紛表示對於憲政民主的支持與嚮往，但與自由主義不同，他們強調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依據上述的標準，編碼時採用了Nvivo軟件作為協助。因為大量的微博內容編碼在篩選中會有很大的困難，因此作者在依據上述對於左右派別的文獻，結合網絡中各位意見領袖在討論中習慣性涉及到的話題以及關鍵詞，提煉了下述關鍵詞，作為在Nvivo中進行搜索時依據。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是否支持市場經濟的維度，筆者選擇了直接對市場經濟的論述，對國有企業的態度以及對土地所有權的態度三個維度的關鍵詞：央企、私有化、國企、國有企業、市場經、土地私有、自由市場、央企、市場化、發揮市場。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選擇的關鍵詞為：美國操縱、美國政府。

政治態度上主要選擇的維度包括：如何看待毛澤東，文革等歷史問題，是否要求憲政民主，是否希望對國家權力進行控制，對重慶問題的看法四個維度，關鍵詞包括：毛澤東、普世價值、民主、憲政、公權力的腐敗、權力制衡、憲法、專制制度、公權力、左派、右派、重慶模式、重慶經驗、重慶做法、重慶成就、薄熙來、全球化、權貴資本、財產公示、財產公佈。

文化的維度主要涉及到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如何看待言論自由兩個維度，關鍵詞包括：文化根基、文化傳統、中國文化、文化靈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輿論管制、新聞審查。

由於左派群體會涉及到自己習慣的一套用詞體系，所以定位左派群體時使用的關鍵詞包括：中共執政、黨的領導、根本政治制度、社會不平等、分蛋糕、蛋糕分、社會平等、社會公平、人人平等、社會不公、社會福利、反改革、房地產、共同富裕。

由於Nvivo可以限定編碼的範圍，本文確定的範圍是包含上述關鍵詞的一整條微博，而不是某句話，這也比較符合微博通常用一條內容表達一個主要含義的習慣。

## 數據分析及結果

### 意見領袖關注關係的派系分析

#### I. 全體意見領袖的關注關係派系分析

依據事先對左、中、右意見領袖的編碼，採用Ucinet軟件進行，得出關注關係圖。從但是，單從圖中並沒有發現左派、右派、中立三個群體形成本文假設中所提到的派系分離狀態，各位意見領袖散落的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分佈在整個群體當中。但是通過數據的計算，仍然發現了較微弱的同質化關注的證據。

一般來講Ucinet提供了進行派系的諸多圖示類分析方法，但是這種派系的分析方法大多適合那些派系結果相對清晰，數據相對簡單明瞭的社會網絡關係，比如n-宗派(n-clan)、k-叢(K-plex)等，通過算法強行算出的派系常常碰到的問題就是沒有社會學的解釋力。

因此本文選擇的是用幾種方式共同來證明假設中左右兩類政治派別的意見領袖人群確實存在著派系化的現狀，讓多種結果彼此形成驗證。

首先，本文採用的是E-I指數的計算。

E-I指數可以用於測量派系林立的程度，主要通過派系內部網絡關係(internal links)和派系之間的網絡關係(external links)的比值來衡量派系內部關係是否顯著強於派系外部關係。

$E-I = (EL - IL) / (EL + IL)$  (羅家德, 2005: 127; Gruz, Wellman, & Takhteyev, 2011)

EL代表子群體之間的關係數，IL代表子群體內部的關係數。該值的取值範圍是[-1, 1]，越向1靠近，表明關係越是趨於發生在群體之外，也就是說反而群體外的互動或者關係密度要更強於群體之內，而該值越向-1靠近，則表示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而當值接近於0的時候，表示內外之間的關係數量相近，接近於隨機分佈。

這裡本文首先考察的是意見領袖彼此關注關係的網絡數據，即本部分的關注關係是通過對原始關注關係進行對稱化之後的雙向關注網絡。

表二 意見領袖彼此關注群組密度(2012、2015)

	年份	右	中	左
右	2015	.184		
	2012	.151		
中	2015	.0897	.0905	
	2012	.0612	.0486	
左	2015	.0865	.0804	.2633
	2012	.0712	.0443	.20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表三 群組層面的E-I值(2012、2015)

	年份	Internal	External	E-I
右	2015	2,462	1,218	-.338
	2012	5,492	3,281	-.252
中	2015	758	1,150	.205
	2012	1,698	2,974	.273
左	2015	158	438	.47
	2012	246	1,121	.64

從表二可以看出，右派與左派的內部關注密度都超過了不同派系之間的關注密度，而中立的群體則密度居中，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在關注的問題上，左右派別之間確實體現了同質性的關注原則。不過這種同質性從整體來看的确很弱，2012年群組層面的E-I值為  $-.004$  ( $p < .05$ )，2015為  $-.092$  ( $p < .05$ )，均接近於0，網絡關係傾向於接近隨機狀態，並沒有明顯的派系分立的結構極化狀況出現。

如果從長時段的變化來看，雖然關注密度在兩年中得到了提升，但是各自群組之內的E-I值都在變小，即變得更加傾向於組內互動了。

從整體上看，網絡關係缺乏同質性特徵，主要原因可能由於大量中立群體的存在，因為在計算整體的E-I值時，反映的是三類群體之間綜合來看是否存在派系林立的情況，因此這個E-I值有一定的侷限性，我們將在下一節中進行修正。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從組間數據來看，如表三，則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即右派的群體傾向於與自己派系內的人聯繫 ( $E-I = -.252$ )，左派的群體則大量的與派系外的人聯繫 ( $E-I = .640$ )，而中立的群體則處於兩者的中間狀態。如果我們進一步仔細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現階段左派的人需要常常以批判右派群體的方式來作為自己合法性的進一步證明。而右派的意見領袖人群在微博平台上佔了大多數，他們需要的是彼此對內的支持與確認，較少特意的去反駁左派群體。

## II. 去除中立群體後關注關係的結構極化

之所以會產生需要去除中立群體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夠讓兩方立場之間的差別更加明確。而且由於本文最初的編碼是在不考慮立場之下編碼完成的，因此才會產生一些態度並不明確的群體，以及立場確實是中立的群體。這一點在未來的研究應該適當警惕，可以在編碼

之前剔除那些不表達態度的群體，因為從嚴格意義來講，他們並不是真正的中立群體。

剔除了兩個群體之後，共剩餘132位意見領袖（第二次數據剩餘127位），重新計算了派系區分的相關係數。

當沒有中間派別存在時，從數據來看，左右兩派的分離狀態非常明顯， $E-I = -.608$  ( $p < .05$ )（2015年 $E-I = -.715$ ， $p < .05$ ），即派系內部的關注要遠遠大於外部關注，形成了明確的左右對立的結構極化格局。

$E-I$ 值只是作為一個佐證，從社會網絡分析圖（圖二）中也可以看出，左派群體其實是相對集中在左下方的區域中的，由於Ucinet在構圖時已經考慮到了點與點之間的度數與距離關係，因此相互靠近的群體更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派系。

在對意見領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整體意見領袖群體的彼此關注還沒有形成像美國那樣彼此不聯繫的程度（如圖一），但是抱團取暖的現象仍然是比較明顯的。這不僅從相互關注的關係中可以看出，從後面的互動關係中也可以看出來。

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Ucinet中QAP對屬性關係矩陣與關注關係矩陣（對稱化）進行相關性檢驗，132位意見領袖的屬性矩陣與相互關注關係矩陣之間的相關係數達到了.116 ( $p < .001$ )，2015年的QAP相關係數達到了.122 ( $p < .001$ )。

### III. 結構對等性分析下的派系極化

現代社會網絡分析的奠基人之一懷特（White, Boorman, & Brieger, 1976）提出，塊模型（block-modeling）可以根據角色之間的互動（而不僅僅根據帕森斯的宏大理論）來解釋社會結構。因此塊模型的研究方法主要關注的也是網絡的整體結構，這與本文所訴求的探析意見領袖們背後的兩極結構的訴求是一致的。

用Ucinet的聚類分析，對132位意見領袖的相關關注關係進行分析，得到了完美的聚類結果，那就是全部的21位左派意見領袖成為一個凝聚子群，而剩餘的右派群體基本以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媒體人三類人為主進行聚類，而對2015年的127位意見領袖的分析中，四個凝聚子群中的一個包含了20位左派意見領袖中的15位，剩餘的三個子群基本上的分類與2013年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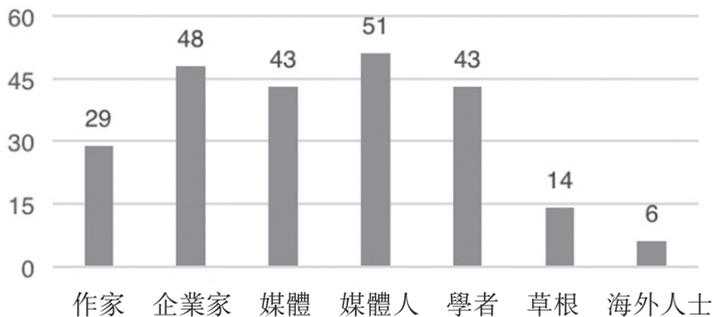
##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這組聚類採用的方法是CONCOR，這是一種迭代相關收斂法，主要基於以下的原理：即如果對一個矩陣中的各個行或者列之間的相關係數進行重複計算，最終產生的將是一個僅僅由1或者-1組成的相關係數的矩陣。也就是通過這種計算就可以把項目分為不同的類別。我們這次採用的是行列均分為兩類，最終形成了四組，這種四組的分類方式也通常是比較有效，且能夠具有社會學解釋力的一種分類方式。且最終每個組的成員都超過了3名，達到了該方法有效解釋所需要的區分度要求。

### IV. 所屬領域不形成新的結構極化

圖四是對234位意見領袖的行業狀況進行簡單分類的頻次圖，作家類別中其實類似於平常分類中的其他，它包含了比如加措活佛、作家、草根群體（比如鞍鋼郭明義）等等，海外主要包括的港澳台的一些知名人士（比如李敖、錢鋼，只要人在海外而不再細分為學者、媒體人等）。

圖四 234位意見領袖所屬行業分類頻次圖



那麼這種以職業為主要同質化標準進行分類的情況下，是否會出現派系的情況？事實上，2013年最後的E-I為.695，2015年的E-I為.455，也就是說都是接近於1的水平，即同樣領域內的人反而更加傾向於與本領域之外的人進行聯繫，而非相反。可以說在意見領袖的層面上，能夠與不同領域的人之間溝通成為一種大家的共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表四 不同時期群組間E-I值

E-I	2012	2015
作家等	.744	.798
企業家	.594	.358
媒體	.638	.279
媒體人	.604	.433
學者	.624	.619
官員	.854	.855
海外	.981	.964

具體來看表四，每一組的E-I值都較高，尤其是海外群體、學者以、官員群體以及其他類的群體。也就是說這些群體更加傾向於與本領域之外的人進行溝通。數據相對較低的企業家與媒體則可以解釋為他們在微博中並沒有刻意的希望突破自己的領域，與其他領域的人溝通，雖然事實上他們的外部鏈接也依然超過了內部鏈接的密度，只是這種程度相對較淺，也可能是這兩個群體其實是微博平台上最為活躍的群體，他們真正承擔了輸出意見，或者作為意見中轉站橋樑，因此其他領域的人的或許主要的連接都指向這兩個群體。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媒體與企業家是數量最多的兩個群體，但是由於E-I值最終是以密度來體現的，所以這與兩個群體的數量無關，主要體現的應該是這兩個群體的影響力問題。

上面我們論述的主要只是從關注關係來看派系問題，解決的研究問題是意見領袖們從政治立場的角度來說，是否有著人以群分的結構極化趨勢。接下來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人以群分之後，是否互動也是基於關注關係的基礎之上呢？關注關係有可能只是你個人的關注願望，但是如果形成了互動，那麼最終有可能成為影響你一件的重要源泉。

靜態關注與動態互動之間的關係。是否互動關係打破了原來相對分離的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還是進一步加強了這種隔離？

## 互動中的派系分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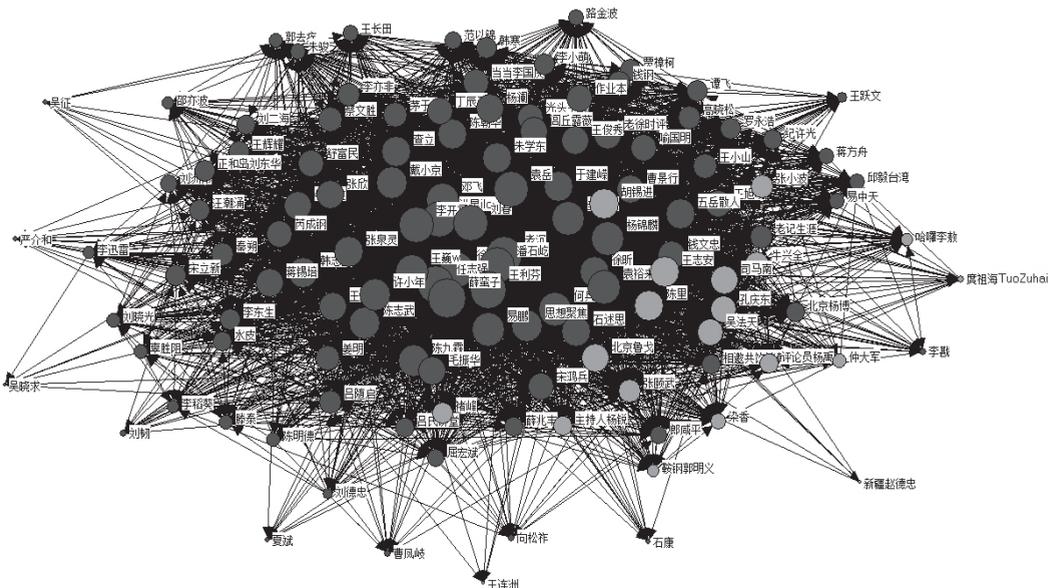
### I. 意見領袖的互動關係分析

互動關係的數據則是有向的多值數據，本文在對關注關係數據的分析中大多數都進行了對稱化處理。而接下來多值的互動數據則直接使用的是多值數據。

最後獲取的互動關係圖與關注關係圖（圖二、圖三）非常類似，此處不再列出每年的互動關係圖，而只選擇呈現四年互動的綜合數據圖（圖五），分年的情況下面進行單獨的論述。圖五表明互動關係也形成了明確的派系分離、抱團取暖的形態。

2012年獲得的三年綜合E-I =  $-.640$  ( $p < .05$ )，2015年數據獲得的四年綜合E-I =  $-.564$  ( $p < .05$ )，E-I值都是更接近於-1，即組內互動更頻繁，而組外互動相對較少的結構極化現象。

圖五 127人左右對立意見領袖互動關係網絡圖(2011-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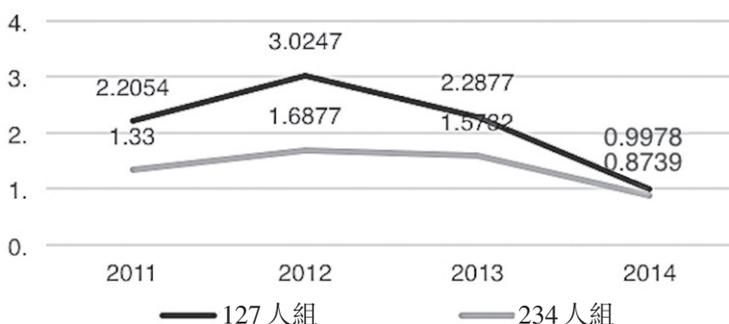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 II. 不同時段中互動關係的派系分立與群體極化

由於「關注關係」是靜態值，對比本文獲取的兩個時段的數據，可以看到關注關係的E-I值都在變小，即相比2012年，2015年的群體之間更傾向於組內認同，即同質化傾向更為明顯了。而「互動關係」則是一種動態表現，本文直接以年為分析單位，分析了從2011年到2014年的全部互動數據。

首先，我們關注一下四個時段內兩類群體的整體互動密度，見圖六。

圖六 不同群體分時段互動密度



從四個時段的數據來看，互動密度呈現了先增加後減少的趨勢，具體的看各個群組的互動狀況以及針對左右對立127人組計算的E-I值，見表五。

表五 分時段各個派系組內互動密度及E-I值

	右派組內	左派組內	中立組內	E-I
2011	2.7482	1.505	1.0625	-.615*
2012	3.4586	5.2917	0.8296	-.609*
2013	2.7193	5.7083	1.1719	-.592*
2014	1.1898	4.42	1.0117	-.594*

註：\*  $p < .05$

從現有的分析來看，意見領袖當中那些態度鮮明的，即左右兩派，互動頻率呈現出了上升再下降的趨勢。

大量的研究表明，互動的頻率與極化程度之間呈正相關 (Lee et al.,

2014; Hart et al., 2015; Himelboim et al., 2013)，但是從本文的研究來看，這種互動頻率增加的情況並沒有普遍性的出現。探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方面2013年開始，微博的網絡大V開始被整頓，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一些中心度極高的網絡大V，比如薛蠻子、李開復等都基於各自的原因極大降低了微博活躍程度，此後吳祚來、李承鵬、方舟子等在圈子當中中心度也較高的大V被銷號，網絡大V的整體活躍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微博的活躍度受到了微信的極大挑戰，整體的互動活躍程度都在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經提到Freelon等(2015)在研究的同主題下的互動情況時發現，九個組當中只有兩個組相對明確的隨著時間變得更加同質化，其他組都是直接形成了同質化的分組，同質化程度接近或者高於80%。

與左右立場的群體相比，中立群體的互動頻率要遠低於左右兩類意見群體，這意味著一種假設，那就是只有那些意見表達相對激烈、意見相對明確的人在微博平台上更加活躍，這也在某種程度呼應了學者對於普通網民的研究，即他們發現網民比一般的非網民民眾有著更激進的意見表達(Lei, 2011)。

如果這種情況長期的持續，那麼雖然我們無法說人們的意見改變如何，但是可以認為微博平台上的兩極觀點會更加的突出和明顯。

### III. 誰在充當中間人？

中間人(broker)概念是由Burt(1982)提出的，他將中間人界定為向一個位置發送資源，卻從另外一個位置那裡取得資源的行動者。一個網絡中的中間人常常掌握著多個群體的秘密或者資源，因而是一種溝通與橋樑的角色。

儘管這個概念在社會學的分析中常常被使用，但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面很少有人試圖具體闡明該現象到底是甚麼，於是古爾德等人就提出了五種類型的中間人角色，分別是協調員、組外顧問、守門人、代理人和組間顧問(Gould & Fernandez, 1989)。

通過Ucinet計算了241位意見領袖關注關係矩陣中擔任中間人的值，該值越高，表明擔任中間人的次數越多。由於本文更為關注的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左右立場的意見領袖們之間的互動，左右派別內守門人與代理人是更為重要的兩個溝通角色，最後選擇了這兩個值在兩類群體中最高的幾位意見領袖，分別是正和島劉東華、徐小平、思想聚焦、李開復、薛蠻子、蔣錫培、石述思、老沉、王利芬、陳里、張頤武、張小波、王志安、評論員楊禹。而2015年的234位群體的中間人分析中發現，李開復、薛蠻子、蔣錫培、張小兵、石述思已經不再起到主要的中間人角色，取代他們的分別是胡錫進、六六、巴曙松、潘石屹、王巍w、袁岳等，其餘的仍然繼續擔任主要中間人的角色。

通過進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知道，這些群體本身雖然立場相對鮮明，但態度都比較溫和，而且有意願在兩個不同的群體之間進行溝通。在最為活躍的溝通者中，媒體人佔了將近一半，這有可能與以下的原因有關。

首先，記者的訓練相對講究客觀，雖然難免表達自己的態度，但都是基於充分的理由而表達的，而且相對溫和。

其次，記者們一般都是從問題入手的，通常是發現問題，但是不常常追究解決問題的方案，而現階段對於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似乎各界已經有相對一致的認識，主要的分歧點似乎在於如何去解決。因此看起來，記者為左右兩派的人提供很好的素材，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立場去解決這些問題。

總之，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會起到一個很重要的溝通各個群體的作用，其中媒體人扮演了很好的溝通各派的橋樑角色。

## 研究意義與不足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左派正在經歷一個上升的時期(馬立誠，2012：209)，但是就本文的分析來看，左派在微博中的力量還是非常薄弱，大量的民主、自由人士仍然是新浪微博的互動主體。與兩個派別相比，在全部241位意見領袖中，有將近100位是擁有中立態度的人員，雖然我們存在大量的中間力量，但是這些中間力量其實並不夠活躍。

總結來看，本研究的理論與現實研究的貢獻在於：

第一，在中國社交網絡的平台上，意見領袖仍然以政治立場的

「左」與「右」作為「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構築的主要原則。這是對於此前有國外關於博客的同質性研究以及此後各國對於精英群體研究在國內的一次拓展。

第二，對意見領袖的分析，基於他們的政治態度的左與右，分析兩方是否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派系，並對這種派系結構進行進一步的互動分析，從本質上講這是一個既有政治傾向的問題。

由於既有政治傾向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特定事件發生後的群體態度走向，因此本文可能對新浪微博平台輿論走向形成一種預測作用，也就是說既有政治傾向的研究是一個更為基礎性的研究。

個人的關注網絡一旦確定之後就很難根本性改變。因此每個使用者的關注群體的構成狀況如何，互動狀況如何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這些群體的構成與特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個體使用者的視野、觀點以及興趣等等。而且這種影響可能會具有長期性、穩定性。

因此從長遠來看，微博平台的影響力研究應該突破現有的事件性的單次影響層面，進入一個長時段影響效果研究階段。針對更為靜態的圈子進行系統性研究，可能從某種程度上提高對動態的事件傳播特性的解釋力，提高研究對於現階段瞬息萬變的網絡事件的預測力。本文正是對這種長效影響力的一次探索。

Erickson (1988) 就提出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相比心理學而言更適合做極化研究。她提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困境在於，都是基於實驗的嚴格控制的環境中實現的，他們忽視了人們的長期關係對於觀點的影響，這種實驗只能關注陌生人之間的短期影響，這體現了她基於對心理學研究態度轉變時所用方法的一種反思。除此之外，她還提出心理學雖然也提出了社會比較理論，但是社會比較雖然能夠影響人們彼此認同的程度，卻無法影響彼此究竟認同甚麼。彼此認同的東西其實是無法進行科學的分析和預測的，因為這是一種歷史的、文化的、前提性的存在，但是我們可以對這種態度在不同的關係中以及不同的社會結構的位置中的同意程度進行研究。這也正是本文對於關注關係所體現的「既有傾向」的同質性如此看重的原因之一。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處首先在於，研究的對象數量相對較小，在數據極大豐富的今天，拓展研究的範圍，獲取更豐富的數據是非常重要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的。其次，本文對於結構極化的研究其實是在社交網絡上對群體極化的基礎和前提性的探索，是對原有極化研究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下，特定的網絡平台上的一次探討，也僅僅針對精英群體，所以研究的普遍性和可推廣性相對較弱。

另外，由於國內網絡政策變化較快，數據的穩定性相對較差，在歷時性研究過程中，無法排除政策對數據的干擾，使得數據較難體現出真正的網絡變化，以後可能需要嘗試其他的方法來進行相關研究，修正現有數據存在的侷限性。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丁漢青、王亞萍 (2010)。〈SNS網絡空間中「意見領袖」特徵之分析——以豆瓣網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頁82–92。
- Ding Hanqing, Wang Yaping (2010). SNS wangluo kongjianzhong "yijian lingxiu" tezheng zhi fenxi-yi doubanwang weil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3, 82–92.
- 樂媛、楊伯澈 (2009)。〈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派別〉。《二十一世紀》，第112期，頁22–34。
- Le Yuan, Yang Boxu (2009). Zhongguo wangmin de yishi xingtai yu zhengzhi paibie. *Ershiyi shiji*, 112, 22–34.
- 李彪 (2011)。〈網絡事件傳播空間結構及其特徵研究：以近年來40個網絡熱點事件為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頁90–99。
- Li Biao (2011). Wangluo shijian chuanbo kongjian jiegou jiqi tezheng yanjiu: Yi jinnianlai 40ge wangluo redian shijian weil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3, 90–99.
- 劉軍 (2009)。《整體網分析講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iu Jun (2009). *Zhengtiwang fenxi jiangyi*.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羅家德 (2005)。《社會網分析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uo Jiade (2005). *Shehuiwang fenxi jiangy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馬立誠 (2012)。《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Ma Licheng (2012). *Dangdai zhongguo bazhong shehui sichao*.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 潘維 (2009)。《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Pan Wei (2009). *Zhongguo moshi—jiedu renmin gongheguo de liushinian*.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 桑斯坦 (2010)。《極端的人群：群體行為的心理學》。尹弘毅、郭彬彬譯。北京：新華出版社。(原書 Sunstein, C. R. [2009].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stein, C. R. (2010). *Jiduan de renqun: Qunti xingwei de xinlixue*. (Yin Hongyi, Guo Binbin Trans.).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unstein, C. R. [2009].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維曼、多米尼克 (2005)。《大眾媒介研究導論》(第7版)。金兼斌、陳可、郭棟樑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 Wimmer, R. D., & Dominick, R. [2005].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7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Wimmer, R. D., & Dominick, R. (2005). *Dazhong meijie yanjiu daolun* (di 7 ban). (Jin Jianbin, Chen Ke, Guo Dongliang etc. Trans.).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immer, R. D., & Dominick, R. [2005].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7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蕭功秦 (2012)。《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Xiao Gongqin (2012). *Chaoyue zuoyou jijin zhuyi—zouchu zhongguo zhuanxing de kunjing*.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 鄭天 (2012)。〈對網絡輿論中群體極化現象的研究〉。《新聞愛好者》，第10期，頁7-9。
- Zheng Tian (2012). Dui wangluo yulunzhong qunti jihua xianxiang de yanjiu. *Xinwen aihaozhe*, 10, 7-9.
- 朱學勤 (1999)。《書齋裡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
- Zhu Xueqin (1999). *Shuzhaili de geming*. Changchun: Changchun chubansh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ldassarri, D., & Bearman, P. (2007). 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5), 784-811.
- Boutet, A., Kim, H., & Yoneki, E. (2012). What's in Twitter: I know what parties are popular and who you are supporting now!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2*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ining* (pp. 132–139). New York, NY: ACM.
- Brundridge, J. (2010).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sphe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et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4), 680–700.
- Burt, R. S. (1982).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 Colleoni, E., Rozza, A., & Arvidsson, A. (2014). Echo chamber or public sphere? Predicting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measuring political homophily in Twitter using big da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 317–332.
- Conover, M. D., Ratkiewicz, J., Francisco, M., Goncalves, B., Menczer, F., & Flammini, A. (2011).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 Proceedings of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 89–96.
- DiMaggio, P., Evans, J., & Bryson, B. (1996). 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3), 690–755.
- Ebbesen, E. B., & Bowers, R. J. (1974). Proportion of risky to conservative arguments in a group discussion and choice shif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 316–327.
- Erickson, B. H. (1988). The relational basis of attitudes. In B. Wellman & S. D.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tling, B., Kelly, J., & Faris, R. (2009). Mapping the Arabic blogosphere: Politics, culture, and dissent. *Berkman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cyber.law.harvard.edu/publications/2009/Mapping\\_the\\_Arabic\\_Blogosphere](http://cyber.law.harvard.edu/publications/2009/Mapping_the_Arabic_Blogosphere).
- Etling, B., Alexanyan, K., & Kelly, J. (2010).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Russian blogosphere: Mapping RuNet politics and mobilization. *Berkman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Public\\_Discourse\\_in\\_the\\_Russian\\_Blogosphere\\_2010.pdf](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Public_Discourse_in_the_Russian_Blogosphere_2010.pdf).
- Evans, J. W. (2003). Have Americans’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An updat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 71–90.
- Feller, A., Kuhnert, M., Sprenger T.O., & Welp, I. (2011). Divided they tweet: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political microbloggers and discussion topic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 (pp. 474–477). Barcelona, Spain.
- Fiorina, M. P., & Levendusky, M. S. (2005). Disconnected: The political class versus the people. In P. S. Nivola & D. W. Brady (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 Baltimo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Freelon, D., Lynch, M., & Aday, S. (2015). Online fragmentation in wartim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weets about Syria, 2011–2013.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9(1), 166–179.
- Gould, J., & Fernandex, J. (1989). Structures of mediation: A formal approach to brokerage in transaction network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 89–126.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

- Gruzd, A., Wellman, B., & Takhteyev, Y. (2011). Imagining Twitter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10), 1294–1318.
- Hart, P. S., Feldman, L., Leiserowitz, A., & Maibach, E. (2015). Extending the impacts of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 Influences on discussion and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37(4), 506–532.
- Himmelboim, I., McCreery, S., & Smith, M. (2013). Birds of a feather Tweet together: integrating network and content analyses to examine cross-ideology exposure on Twitter.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2), 40–60.
- Kelly, J. (2008). Pride of plac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Berkman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Pride%20of%20Place\\_MR.pdf](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Pride%20of%20Place_MR.pdf).
- Kivran-Swaine, F., Govindan, P., & Naman, M. (2011). The impact of network structure on breaking ties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Unfollowing on Twitt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101–1104). New York, NY: ACM.
- Lei, Y. W. (201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8(3), 291–322.
- Lee, J. K., Choi, J., Kim, C., & Kim, Y. (2014). Social media, network heterogeneity, and opinion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4), 702–722.
- Lim, Y. S., & Park, H. W. (2013).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ians' web visibility and political finance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s National Assembly members. *New Media & Society*, 15(1), 93–108.
- Maoz, Z. (2006). Network polarization, network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200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4), 391–411.
- Mayers, D. G., & Lamm, H. (1976). The group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3(4), 602–627.
- McPherson, M., Smith-Lovin, J., & Cook, J. M.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415–444.
- Neuman, R. W. (1991). *The future of the mass aud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 Noel, A., & Therien, J. P. (2008). *Left and right in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ng, T.-Q., Liu, M., Wu, Y., & Liu, S. (2014). Follower-Followee network,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vote agreement of the U.S. Members of Congre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rice, V., Nir, L., & Cappella, J. N. (2005). Framing public discussion of gay civil un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9(2), 179–21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

- Pruitt, D. (1971). Choice shifts in group discussion: An introductory re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3), 339–360.
- Scheufele, D. A., Hardy, B. W., Brossard, D., Waismel-Manor, I. S., & Nisbet, E. (2006). Democracy based on difference: Examining the links between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heterogeneity of discussion networks,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4), 728–753.
- Stoner, J. F. (1961).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 Stroud, N. J. (2008).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 *Political Behavior*, 30, 341–366.
- Sunstein, C. R. (2006).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 C., Boorman, S. A., & Brieger, R. (1976). 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I. blockmodels of roles and pos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730–779.
- Wojcieszak, M. (2010). "Don't talk to me": Effects of ideologically homogeneous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ly dissimilar offline ties on extremism. *New Media & Society*, 12(4), 637–655.
- Wojcieszak, M., & Rojas, H. (2011). Correlates of party, ideology and issue based extremity in an era of egocentric publ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6(4), 488–507.

## 本文引用格式

龐雲點、苗偉山 (2017)。〈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以新浪微博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2期，頁59–90。